

新儒家梁漱溟的道德教育思想述评

黄利芬, 吴洪成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梁漱溟重视道德的正向功能,主张以德代法来维持社会秩序。情意教育、精神陶炼和心理调整是其德育思想的核心,又将亲师取友、自我体认、反省自身的德育方法贯穿其中,体现了现代教育理念的因素,为当前的德育工作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梁漱溟;新儒家;道德;德育思想;德育方法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4)03-0098-07

梁漱溟(1893—1988)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儒家传统主义者,在实践中不断践履孔子学说并致力于儒家思想的阐发,被美国学者艾恺誉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从贯穿其一生的业绩及活动来看,他不仅是一位思想深邃的理论家,同时也是敢于将理论付诸于实践的实干家,并自称是一个“为思想而行动的人”,他的教育思想和主张在所领导的乡村建设运动中得到了尽情的挥洒。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梁漱溟的德育思想带有强烈的儒家气息,所关注的是“发端于先秦,大兴于宋明理学时期”的儒家心性之学,德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即为“心性论”,主张通过复归理性重建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以挽救处于危亡边缘的中国社会,并称自己研究学问并非为了学问本身而是要将自己对人生、社会问题的思考认识应用到实际当中,以改造、影响社会。他论述道:“我心中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的不外两个: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中国问题)。我早自年少时期对人生问题有过烦闷,有过追求。而当我是一个中学生的时侯,又对社会问题——处于危亡之中的中国如何自救图存十分关心。”^[1]同时指出,中国问题不是什么旁的问题,而是文化失调的问题,要解决中国问题,靠的是社会礼俗,重在教化,而非依赖硬性法规加以约束,主张以德代法。这样一来,德育就不仅是构成教育理论的有机成分,更成了他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方式。

一、德育思想基础——“以德代法”的道德价值观

作为新儒家的一代宗师级人物,梁漱溟的思想深深扎根于儒学,其哲学根底是建立在王阳明学说之上的,在性与情关系的探讨上,与王阳明的心学有相似之处,坚信人类先天赋有一种迁善的能力,“人都是要求善求真的,并且他都有求得到善和真的可能”,因为“人在直觉上都自然会找到对上去”^[2]。把人心分为情与知两方面,其中,情是情感本能,也可称为是直觉;知即理智,是人类的欲望之源,是人与外界相区分的凭证。由于人的认识活动受本能直觉支配,而且人在直觉上都自然会选择及走向合理

收稿日期:2014-02-26

作者简介:黄利芬(1987-),女,河北邯郸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

的方向,因此梁漱溟主张“任直觉”,所谓“任直觉”实质就是倡议遵循人的自然本能,而自然本能即“求善的本能”或曰道德本能。他把直觉看作是人生的工具,理智当作科学的工具,认为人们本性发用时所使用的工具为人生工具——直觉时则为善,因为“率性之谓道”;反之则可能走向恶。但直觉又不会直接发挥效用,需要借助礼乐的作用。只有顺着人们的本能直觉,借助礼乐给人以直达内心深处的情感冲击,内心与外界相沟通,感觉和理智才能借助直觉指导我们的行为,使思想与行动同步趋向于善。对此,他解释道:“人原是受本能、直觉的支配,你只同他絮絮聒聒说许多好话,对他的情感冲动没给一种根本的变化,不但无益,恐怕生厌,更不得了。那唯一奇效的神方就是礼乐,礼乐不是别的,是专门作用于情感的;他从‘直觉’作用于我们的真生命。”^{[2]468}

基于以上认识,梁漱溟指出共同的价值不能靠机械的法律条文表达,而需要依托外在的礼与内在的理(道德标准),因为人类的道德本能使人类先天赋有迁善的能力,且中国自古是个伦理本位的社会,社会秩序的维持依赖于礼俗,过去和将来都如此。他设计复兴农村的第一条理念即以“道德启蒙开路”,强调必须先为农民找到精神上的出路,并以人生向上的目标激励之,才能完成乡村改造的任务,渐以实现中国社会的复兴。其中,“人生向上”即“理性”,理性是天然内在于人的,属道德自觉的机制保障,“道德不外情义,于此有其自觉,则为理性”^{[3]813-814}。具有理性的人通常有平静通达的心理,但理性天然内在于人,又并非纯属放任自流,听之任之,是需要渐次开发的,而这一工夫也在礼乐,主要是通过礼乐作用于直觉,使直觉顺应理性的要求,对人的情感进行调控,从而作出适当的行为。之所以以礼乐为依托在于“抽象的道理,远不如具体的礼乐。礼乐直接作用于身体,作用于血气,使人的心理性情变化于不觉,而理性油然能现,其效乃最大最神”^{[3]387}。关于“人生向上”的内涵,主要是指“不以享福为念,而惧自己所作所为有失于理”,而实现的途径则在于“发动他的进取心是更要紧,将来的太平日子,必须靠我们的进取求得之。必须在农业上、工业上、教育上、政治上各方面都求进步,……所以现在要紧就是打开他这个窍,打动他进取的心,使他乐生进取,发生公共观念,发生齐心合作的要求”^{[2]683}。由此,现在需要做的就是通过对人理性的启发教育,发动人们的“进取心”,不仅包括道德意义上的求善,还包括一切领域中的求进步之意。这样,未来社会秩序的维持才能建立在以道德自律为核心的礼治基础上,而法律只是一种辅助手段。社会秩序的维持不能完全依靠法律的原因在于法律是作为一种强力存在的,而强力的约束会使人感到痛苦。

“以德代法”观认为,社会的冲突及人际活动交往遇到问题首选道德而非法律的方法加以解决,道德的方法要求准情夺理,按情理而非强硬死板的法律条文来判别是非,并以秉持情义的原则去调和矛盾纠纷。乡治中主张慢慢养成省察宽恕的风气,不用法律去干涉,法律会伤害人与人之间的情义,而将问题归于道德协调或感化,放在教育的层面上加以管教,本着爱惜的情义来督导和规劝。这一观念或策略尤其适用于乡村社会化教育,而这又恰是梁漱溟教育理论及实验的主要内容及特色所在。恰如他所表述的那样:“乡村的事却断不能用法律解决的办法,必须准情夺理,以情义为主,方能和众息争;若强用法律解决,则不但不能够调解纠纷,反更让纠纷易起。”^{[2]706}“本来一乡一村即等于一家,一家之中彼此应当有情义,乡党邻里之间也是一样,不能用强硬的法律解决的办法;一用法律则有伤情义了……所以我们不得不把他变了,把原来用法律的我们改用德教,不用法律解决而用教育的意思,从教他向上学好爱惜他的意思来规劝他”^{[2]704}。

“以德代法”观的另一层意思即“以礼代法”。因为道德本身是抽象的、内在于人的,必须将其具体化、外在化才能为人们所归依,其中起作用的便是礼俗。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的目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立新礼俗。

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的社会组织构造,是形著于社会礼俗,不形著于国家法律;中国的一切一切,都是用一种由社会演成的习俗,靠此习俗作为大家所走之路(就是秩序)。我常说:人类的生活必是社会生活,而社会

生活又须靠有秩序,没有秩序则社会生活不能进行。西洋社会秩序的维持靠法律,中国过去社会秩序的维持多靠礼俗。不但过去如此,将来仍要如此。中国将来的新社会组织构造仍要靠礼俗形著而成,完全不是靠上面颁行法律。所以新礼俗的开发培养成功,即社会组织构造的开发培养成功,新组织构造、新礼俗,二者是一件东西。^{[4]276}

并且指出新礼俗就是中西文化的沟通调和,是中国问题得以解决的关键,新礼俗的成功建设意味着中国新社会的建成,中华民族的复兴指日可待。

我们讲新的建设,就是建设新礼俗。那末,所谓新礼俗是什么?就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完全沟通调和成一事实,事实出现我们叫他新礼俗),不只是理论上的沟通,而要紧的是从根本上调和沟通成一个事实。此沟通调和之点有了,中国问题乃可解决。现在中国问题所以不好解决,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到了深微处——中西人生精神的矛盾,找不出一个妥帖点,大家只在皮毛上用力,完全不相干!所以我们必须从此根本矛盾处求其沟通调和,才是真的解决。从根本矛盾求得沟通调和之点,把头绪找清楚了,然后才有用力处;如果用不上力量,则你建设也是白建设!再再找补一句,当中国精神与西洋长处二者调和的事实有了时,就是一个新社会的实现,也是人类的一个新生活。新社会、新生活、新礼俗、新组织构造,都是一回事,只是名词不同而已。^{[4]278}

以道德代替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固然最贴近人的情义,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但是道德主要依据认识、情意及信念等认知与非认知的心理活动,是不具有强制力的,需要建立在人们高度发达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自觉基础上,至少近现代直至目前,中国人的道德素养是远远达不到的。所以,梁漱溟的这一思想不免沾染有夸大道德社会及个体功能的“乌托邦”习气。不过,他的这一主张在道德之风沦丧的当下是值得学习发扬的,在我们极力推崇法治的时代,道德的作用无形中被忽视,本来道德是可以作为法律的援助手段规范社会秩序和人们行为方式的,可是道德意识与能力的缺失使得法律在一些不触犯法律条文却有失社会公德的行为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所以,从这一层面上说道德重建仍显得颇为重要。

二、德育的主要内容

德育内容即对受教育者施以道德教育的诸种影响资源及素材,具体的德育内容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征,主要受到社会公共道德准则的制约。梁漱溟通过对当时社会环境及道德现状的分析,将德育内容归为情意教育、精神陶炼与心理调整三大部分。其中,情意教育在于个体生活道德的养成,精神陶炼侧重个体社会道德的训练,而心理调整则试图通过个体的自我反省来达到道德上的完满。

1. 情意教育

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中对东西方教育的不同作了阐述:“大约可以说中国人的教育偏着在情意的一边,例如孝弟……之教;西洋人的教育偏着在知的一边,例如诸自然科学……之教”^{[5]8}。并指出造成这一区别的原因在于“东西方文化的路径根本异趣”,而两者不可偏废则是完全的合理的教育。

梁漱溟看重情意教育,认为它是中国教育特色和优势所在,需要振兴发扬。因为,情意乃人之本能,是人与生俱来,不虑而知的,是生活的根本。

生活的本身全在情意方面,而知的一边——包括固有的智慧与后天的知识——只是生活之工具。工具弄不好,固然生活弄不好,生活本身(即情意方面)如果没有弄得妥贴恰好,则工具虽利将无所用之,或转自贻戚,所以情意教育更是根本的。这就是说,怎样要生活本身弄得恰好是第一个问题;生活工具的讲求固是必要,无论如何,不能不居于第二个问题。所谓教

育不但在智慧的启牖和知识的创造授受,尤在调顺本能使生活本身得其恰好。本能虽不待教给、非可教给者,但仍旧可以教育的,并且很需要教育。因为本能极容易搅乱失宜,即生活很难妥帖恰好,所以要调理它得以发育活动到好处;这便是情意的教育所要用的工夫,——其工夫与智慧的启牖或近,与知识的教给便大不同。从来中国人的教育很着意于要人得有合理的生活,而极顾虑情意的失宜。从这一点论,自然要算中国的教育为得,而西洋人忽视此点为失。盖西洋教育着意生活的工具,中国教育着意生活本身,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也。^{[5]10-11}

中国教育虽然重情志本身,但教育方法不当,往往试图以知识教育之法唤醒人的情意,以期达到情意教育的目的。其实,人的生活态度与行为习惯的改变,不能依赖于单纯的道德说教而必须让道德主体体验到它是个问题并且是他本身的问题才行,即变“外界使他晓得”为他“内心的一种要求”,唯有如此,道德主体才有提升自我道德的欲望和内在动力。单纯灌输给孩子应然的教育并不能使他的情志上有变化,打动不了他的内心,反而会扼杀他的创造性,也必然会忽视人的主体性参与,忽略主体的情感体验在情意培养上的作用。梁漱溟看到了这一点并对如何实施正确的情意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然中国教育虽以常能着意生活本身故谓为得,却是其方法未尽得宜。盖未能审察情的教育与知的教育之根本不同,常常把教给知识的方法用于情意教育。譬如大家总好以干燥无味的办法,给人以孝弟忠信等教训,如同教给他知识一般。其实这不是知识,不能当作知识去授给他;应当从怎样使他那为这孝弟忠信所从来之根本(本能)得以发育活动,则他自然会孝弟忠信。这种干燥的教训只注入知的一面,而无甚影响于其根本的情意,则生活行事仍旧不能改善合理。我们对于本能只能从旁去调理它、顺导它、培养它,不要妨害它、搅乱它,如是而已。譬如孝亲一事,不必告诉他长篇大套的话,只须顺着小孩子爱亲的情趣,使他自由发挥出来便好。爱亲是他自己固有的本能,完全没有听过孝亲的教训的人,即能由此本能而知孝亲;听过许多教训的人,也许因其本能受妨碍不孝亲。在孔子便不是以干燥之教训给人的;他根本导人以一种生活,而借礼乐去调理情意。但是到后来,孔子的教育不复存在,只剩下这种干燥教训的教育法了。这也是我们以后教育应当知所警戒而改正的。^{[5]11-12}

除了单纯的道德说教,赏罚的方法在情意教育中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赏罚是利用人算账计较的心理而支配他的动作,使人因赏而为善,因罚而不为恶,或是贫,或是避,最妨害情的心理”。“情的方面要引导他由内而外,自由发展出来,唯有顺着本能调畅,别无他法”^{[6]64}。

梁漱溟反对道德说教和赏罚,重视个体的情感体验,提倡个体通过道德的自我体认去积极主动地提升自身修养水平,这是德育方法由他律到自律的转变。之所以以自律取代他律,原因在于外在行为规范的强力约束对入道德行为所起的作用远不如入的道德自律自然、明显。基于此,他认为,人的行为活动应靠道德自律和入的习惯、礼俗达到自我规范,以成为一种很自然的行为习惯。

梁漱溟从情意教育与知识教育不同的社会效用价值出发,认为情意是人生活的根本,是知识这一生活工具发挥效用的依托,并把情意教育作为中国教育的特色和优势,其实这是中国伦理本位社会性质在入的道德观念和教育上的反映。情意教育调理本能、着意生活的特性,使得它与知识教育迥异,因此,两种教育的方法必然不可混用。运用知识教育之法施行情意教育只会适得其反,真正适用的方法是借助礼乐来调理情意,这就同上文所述的礼乐与直觉、理性的关系沟通在了一起。到此,梁漱溟为我们实施情意教育提供了一定的方法指导,其中不少思想与现在提倡的自然教育理论有相通之处。

2. 精神陶炼

如果说情意教育着重入生活本身的调理,处理入生活之问题,诸如培养入之孝悌忠信等,是个人生活之道德养成;那么入生行谊教育则着重以改造入心开始来培养入之于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已经从小我上升到了大我、由个人扩展到了社会,是入社会道德的学习与训练。

梁漱溟认为改造社会必以改造入心开始,因此特别重视精神陶炼的作用,并把它作为道德教育的

核心。其实这是由“乡村服务人员之精神陶炼”而来的。所谓精神陶炼,就是要启发每个人的“志气愿力”,其中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合理人生态度的指点、中国历史文化的分析和人生实际问题的讨论,而且这三者都以“中国民族精神”为核心,旨在从整体上认识中国民族精神,复兴以理性为特征的中华文化,通过锻炼个体的心理品质以实现为中国社会服务的宏愿。

为了达到精神陶炼的目的,梁漱溟在山东邹平乡村教育研究院第一阶段(1931—1933)设立的乡农学校中安排了精神陶炼课程,且在各层次的教育中均有体现:“对于儿童教育的内容,主要有国语、算术、常识和公民等,尤其重视精神陶冶;对于男性青年,所讲授内容有公民学(包括时事政治、精神陶炼)、识字、基础知识、武术等,授课时间每晚7—9时;初高级乡农学校的教学内容主要有识字或者是基本的文化知识教育,而以精神的陶冶为重点。”^{[7]217}并指定以《弟子规》、《朱子治家格言》、《三字经》等为精神陶炼课程的初步教材,《礼记》、《小学》作为该课程的教授课本。安排精神陶炼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启发大家的深心大愿和救济“破产”了的乡村精神,让乡下人活起来。这里所谓精神的破产,指一切旧的风尚、规矩、观念都已摧毁而新的风尚规矩此刻尚未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又指出,乡村建设这一浩大宏伟工程的实现依赖于人的深心大愿,只有深心大愿发出来,人们才有力量担负乡建的任务,所谓的“深心大愿就是要你有真问题,不要有假问题,要有大问题,不要有小问题。如果我们发现有真问题、大问题,此即深心大愿发出来的时候”^{[5]135}。并主张应具有佛教家的深心即悲悯,这里的悲悯并不限于对灾难而发的悲悯,而是无时无刻不存在于个体的对于人生的悲悯,是通过反省人生发出来的,已经从个人拓展到了社会。

3. 心理调整

梁漱溟认为,人单求知识是毫无用处的,紧要的是注意自己的缺欠并调理之,以求“心志清明,思想有条理”。唯有自己的心思心情健全(即道德上达到完满),才算是真学问,才是真进步。人优于动物之处,一在自觉,二在能调理自己。并指出调理自己需要注意心思与心情两方面。“所谓心思,即指理智上逻辑条理要清楚,但理智从属于感情”,而“心思之清楚有条理,是与心情有关系的;在心情不平时,心思不会清楚,所以调整心情是最根本的”。所谓调整心情是要改正懈与乱,使自己不散懈,不暴乱;即调整自己,“使心情平和有力”,这也是“改变气质的根本功夫”^{[4]50}。

心理的调整依赖于自身反省,梁漱溟特别重视反省在个人道德修养中的作用,认为“人在世上生活,如无人生的反省,则其一生就活得太粗浅,太无味了。无反省则无领略”^{[4]58}。人内心往往不由自主地存在许多矛盾冲突,这时就需要反省自身,以忏悔、自新。反省自身时需要选择一个清静的环境,“须大家在清静无人时,自己反省,鉴察过去;把从前不对的地方,深自‘忏悔’掉泪抛开过去”^{[4]45},以求自新。朝会是梁漱溟带领学生反省自身的一种独特的学习和修身活动。做朝会时,要求“初时都作静默,要大家心不旁骛,讲话则声音低微而沉着,话亦简切。到后来则有些变了,声音较大,话亦较长。但无论如何,朝会必须要早,要郑重,才能有朝气,意念沉着,能达入人心者深,能引人反省之念者亦强。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4]41}。

然而,毋庸讳言,教育与发展绝不是个体性行为,而是个体与环境、群体及他人交互作用下合力的效果。自古道:智者不能自见其面,勇者不能自举其身。人是很难看清楚自己的,而且即便看清了也不易随时自主地调理自己,梁漱溟指出,此时唯一的方法就是“亲师取友”,原因在于“每人常会把自己忽忘了,……就是靠朋友的好处,以融化感应自己的短缺而得其养,假定我的脾气是急躁的,与脾气和平者相处,可以改去急躁;我的精神不振,而得振作的朋友,我处于其中,也自然会于无形中振作起来”^{[4]52}。“亲师取友”的另一层意思是教师与学生为友,教师要关注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并给予指导。“所谓与青年为友,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帮助他走路;二是此所云走路不单是指知识技能往前走,而实指一个人的全生活”。“我的意思,教育应当是着眼一个人的全生活,而领着他们走人生大道,于身体的活泼、心理的活泼两点,实为根本重要;至于知识的讲习,原自重要,然固后于此”^{[6]784-785}。与学生为友,不但可以

引导堕落者奋勉,指点烦闷者使其得以安慰、勉励,造就学生,也可以造就老师自己,使其自身道德得以提升。此外,“亲师取友”还强调教师的道德示范作用,要求教师以身作则,以自身道德感染学生。这就充分肯定了良好的社会及学校环境与道德榜样力量在个体道德健康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三、德育思想的评价

1.“精神陶炼”的以德育为重思想体现正向功能

在梁漱溟看来,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袭来,使得人们过于追求物质利益,不以言利为耻辱,反而把追逐利益看作高尚的事情,最终迫使人们忽视了对于德行的培养,致使道德信念濒于崩毁;西方教育制度的移植和推行使得教育成为了追求功利的牺牲品,获得文凭以享受优质生活的本钱,这些思想滋生了人们颓废、奢侈的生活习惯,给社会造成了一种公开贪婪的气氛,使得人们看不到人生真正的意义所在。因此,源于西方的现代教育只能养成恶劣的习惯,且导致道德上的松弛滑落。梁漱溟认为,要解决以上问题,必须要建立新礼俗、新秩序,并且这一新礼俗是以伦理情谊为本原,以人生向上为目的的,是一个纯粹的理性组织。而这一组织的建立必以道德文化教育为基点,以道德理性自律为依托,以道德实践为归属。这些便是他德育目标思想的体现,即通过道德教育构建一种新的礼俗以复归理性,发动人的进取心,养成人生向上的态度。

梁漱溟重视道德的正向功能还体现在他所设计的学校办学规程中,如山东曹州中学坚持“无论学生纳费多少,将受同等待遇”的原则,体现了公平教育理念;并且这种以品行和道德取代智力或学术水平作为学生入学的最后尺度,恰恰弥补了应试教育的弊端。在教育管理中,对学生的测评考核同样不以智力和学习成绩为主,资质和态度才是考查的主要内容,采取评价方式多元化,坚持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同时偏重质性评价,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这样的办学理念反映了梁漱溟以道德为重的儒家思想,这种理念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往往具有较高的综合素养。

当前,我国现实教育仍存在偏于知识记忆而忽视道德情操培养的问题,德育工作者并未照顾到学生身心的各方面,以致于各种道德沦丧事件频发,造成了许多的社会和人生悲剧。由此,梁漱溟重道德教化并试图通过道德教育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思想和实践是值得称赞与学习的。

2.“道德体验与内省”的德育理念具有积极意义

根据学生偏于模仿的心理特点,梁漱溟强调团体中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要求教师以身作则,以自身道德感染学生;尤其低年级学生,他们的模仿意识和模仿能力较强,教师良好道德行为的展露,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学习的样本。亲师取友,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德育环境,教师和伙伴的力量有助于其道德行为习惯的养成。德育活动中重视并发挥教育主体的能动参与,不以硬性规章条例规范学生道德行为,而是强调学生的主体建构、道德体验与内省,注重道德的自我养成,为教育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极大空间。这样背景下的德育工作将不会枯燥、被动,个体在主动的参与中享受着德育的浸润,同时,师生间由严肃的权威式关系转为亲密的师友关系。

当代基础教育新课程标准倡导多维关注学生的发展,倡议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教学中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教师是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引导者,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学生的主体性参与,是服务于学生的。梁漱溟注重团体道德精神及习惯的教育,并主张团体中师生亲密关系的形成,他的团体式生活思想是以“乡约”为基础的,强调组织成员相互间的道德监督,以期通过彼此监督使道德品质日臻于完善。很显然,这种思想观念意在建构团体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并着力道德环境对人内心的渗透,通过发挥道德情感的感染力来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他指出办学的动机就是交友,与学生为友,并指点学生的全部生活,促进学生知情意行的全面发展,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但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全人生的指导必须先对学生有一定的了解,为了便于教师对学生有全面的了解,梁漱溟主张实施导师制以建立亲密的师友关系。导师制主要是指一位导师负责特定数量学生的全部生活,对其

班组的学生进行身心各面的全人生指导。为了保证这一任务的完成,导师不可随意而定,要有硬性的规定,即导师自身应是一位知识渊博而又具有高尚道德操守的人,这样才能够对学生的全部人生进行妥帖、恰当的指导。此外,每位导师名下的学生数量不宜多,如此分工组织才能照顾到每位学生生活的全部,否则,就难免会影响德育的效果。我们的德育工作也应吸取梁漱溟导师制的方法,德育工作不能只交由班主任或是辅导员一人负责,科任老师也是有义务和权利指导本班学生的,责任的分摊有利于照顾到每一位个体,实现德育过程通过主体性道德体验与内省的活动从而真正获得其成效的最大化。

3.“寓教于情”的德育手段值得肯定

寓教于情,注意学生情趣的激发,作为一种教育手段方式或艺术,是德育工作者所普遍接受的,但去赏罚的教育主张是否合适,当前教育行为中到底该不该去赏罚则需要进一步探讨。不过,我们比较赞同梁漱溟的观点,觉得利用奖赏或是惩罚措施都源于学生主体之外,而且其自身的标准尺度也是当代乐学教学论的核心理念,同样适用于道德教育活动,以培养学生的德行修养。因此,仅凭赏罚的措施来规范学生的行为,并不能使其在内心认同该种条规,改变的只是学生的外在表现,难以达到道德教育的真正目的,学生的道德能力及水平本身或许并未得以提升。

毋庸讳言,梁漱溟的德育思想包涵了许多中国传统德育伦理的旧观念,好多都已经不合时宜了,但其间所蕴含的合理与积极元素仍不失为当今德育的宝贵营养。德育内容不能凝固不变,而应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使之处于动态变化中,不断地丰富和调整,以符合当前的社会现实状况并直入人们道德问题深处。德育内容最好取材于现实生活实例,以现实的道德事件说事更能引起人们的共鸣。除了德育内容之外,德育标准、德育方法等也同样都不是恒定的,都会随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相应的变化。道德无终点,因而,我们永远都无法到达道德的制高点。基于此,我们要把德育活动持久地开展下去,在动态中求创新,动态中促进步,一步步接近道德的制高点。

参考文献:

- [1]梁漱溟.梁漱溟学术精华·自序[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0.
- [2]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一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
- [3]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六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 [4]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二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 [5]马秋帆.梁漱溟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 [6]梁漱溟.梁漱溟全集:第四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 [7]陈学恂.中国教育史研究·现代分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Comments on Neo-Confucianism Liang Shuming's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Huang Lifen, Wu Hongcheng

(College of Edu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Liang Shuming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positive function of moral and advocates replacing the law with moral to maintain social order. Affective educ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spirit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re the core of his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throughout which are the methods of moral education-closing teachers and choosing friends, self awareness and reflection. His thoughts penetrate modern education concepts and give our current moral education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Key words: Liang Shuming; neo-confucianism; moral;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moral education method

(责任编辑 石丽娟)